



生处能熟 熟处能生

◎学 诚

一、生处能熟靠串习，熟处能生在用心

我们修行、学习、做事，就像做饭，都要“生处能熟、熟处能生”。

什么叫“生处能熟”呢？生处能熟，就好比要把白米煮成熟饭，火烧大了不行，烧小了也不行，否则，要么烧焦了，要么煮不熟，做出来的饭都很难吃，只有火候适中，并且时间刚刚好，煮出的饭吃起来才可口。所以，烧火煮饭既需要把握好一定的火候，也需要掌控好一定的时间。炒菜也是同样道理，油、盐、酱、醋等各种调料，只有放得适量，炒出的菜才好吃，如果放得不适当，菜就会很难吃，而且炒什么菜放什么调料，也都是有讲究的。所谓生处能熟，就如同一开始我们不懂得如何炒菜，但是通过看菜谱学习、请教有经验的厨师、和同行互相切磋交流，慢慢地就能熟练地炒出可口的佳肴了。

什么叫“熟处能生”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对以前惯熟的恶见、恶习要去淡忘、生疏；另一方面对以前惯熟的非恶见、非恶习要去超越、突破，行为处事还如同面对生疏的人、事、物一样，非常认真，用心对待，不断追求进步，乃至达到熟而生巧的境界。如《五灯全书·海会圣心觉禅师》说：“风寒思衣，吃饭思饱，寒也不寒，饱也不饱。生处更要熟，熟处便生巧。”就如同虽然能把饭煮熟，但不等于就能把饭煮好。同样地，我们把一件事做完了，并不等于事情就做得圆满了；我们的话说完了，

并不等于话就说得契理契机；我们饭吃完了，并不等于饭就吃得营养可口；我们上殿结束了，并不等于戒定慧的功夫就有长进。平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成长和进步，原因就出在这里。虽然都是在做事情，但是“做完”和“做好”则是两回事。“做完”只是代表任务完成了，但是否就做得有功德呢？不一定。如果事情做得不好，可能不但积不到功德，还会损失福报。只有把事情“做好”了，才能真正获得圆满的功德，积累到成佛的资粮。

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首先要做到熟练。有很多事情虽然我们一开始并不擅长，但是只要抱着学习的心态，经过不断的练习，就能够熟练掌握。就像一个厨师炒菜，一直都用心学习，经过各种大小宴会的锻炼，越做越有经验，菜就会越炒越好，最后就能够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无论什么佳饌菜肴他心里都非常清楚该怎么配料，知道怎么炒才好吃。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七曼殊室利分》说：“我昔初学作意现入此三摩地，非于今时复更作意现入此定。如善射夫初学射业，注心粗的，方乃发箭，久习成就，能射毛端，不复注心在彼粗的，随所欲射，发箭便中；如是我先初学定位，要先系念在不思议，然后乃能现入此定，久习成就，于此定中不复系心，任运能住。所以者何？我于诸定已得善巧，任运入出不复作意。”（卷第五百七十五）《正法念处经·观天

品》说：“又如瓶师，因缘合集，以久习故，泥团成瓶。如是之人，勤心发念，修集因缘，如缘生瓶。”（卷四十六）所以，经常的练习，即串习，是非常重要的。如《瑜伽师地论》说：“此勤修数息念者，若于中间其心散乱，复应退还从初数起，或顺或逆。若时算数极串习故，其心自然乘任运道，安住入息、出息所缘，无断无间，相续而转。”（卷第二十七）又说：“善修心者，谓于此定长时串习，得随所欲，得无艰难，得无梗涩，速能证入。不善修心者，与此相违，应知其相。”（卷第二十八）《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说：“若欲修慈，先缘亲品。于亲品中，先缘上品。上品亲者，谓自父母、轨范、亲教，或余随一可尊重处、智慧多闻同梵行者。于此上品亲有情境作是思惟：云何当令此有情类得如是乐？然心刚强，难可调伏，从无始来串习成故，于极有恩诸有情所恶阿世耶（‘阿世耶’即意乐，亦云种子）任运生长，善阿世耶虽作意起而不能住。复应勇励思其重恩，制心令住，如以芥子投于锥锋，虽有著时而难可住，久习不已，加行乃成，由善巧力投之方住。如是行者于上品亲要勤修习与乐意乐，经于多时，乃得坚住。”（卷八十二）我们修学佛法的终极目标是成佛，要圆满无量深广的福慧，更是需要长期不断的修习。如《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善解方便品》说：“亦如有人习射法，习之不住经多岁，射法久习得尽妙，一一箭发无不中。最上般若行亦尔，修习智慧及方便，直至众善悉圆满，方获最上神通力。”（卷二）

又例如北宋欧阳修《归田录》中“卖油翁”的故事讲：“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唯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翁曰：‘我亦无他，唯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由此可见，只要坚持练习，从一般的生活小事直至菩萨大行，都可以做到“生处能熟”。

但另一方面，熟练了就一定能够生巧吗？也不一定。关键在于用心，否则人就变成了机器。机器做事很熟练、很精准，但因为没有心，所以无论重复多少遍，都只是一种机械的重复而已，不能灵活地随机应变。人就不一样，人可以在做事中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方法，从而把事情做得越来越好。天底下的卖油者很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卖油翁那样滴油不沾的境界呢？显然不是。这说明任何精湛的技艺不仅需要不断的反复练习，还要真正用心。那位卖油翁之所以能够达到滴油不沾的纯熟境界，应该是平时很用心的缘故。因此，练习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数量，还取决于每次练习的质量，好的质量则来自于认真肯学的心态。正如《报恩论》中所说：“譬如一切技艺，从生至熟，乃至熟能生巧，无不皆从肯学而成。”（卷下）

我们常常这样赞叹一个人，说他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平凡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习以为常、不断重复的事情。不平凡又是指什么呢？这是指我们的用心程度。熟练之后还能很用心地去做，才能熟能生巧。否则，虽然事情做得很熟了，但如果不用心则一样做不好。

可以说，心是无尽的宝藏，它有待我们不断去开发。在汉语里，关于“心”的成语很多，比如“三心二意”、“心猿意马”、“心不在焉”、“身在曹营心在汉”等等，这些都是不用心的种种表现。还有句话叫做：“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就是说，口里虽然在念，但心却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在日常的早晚课、拜佛、诵经之中很可能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内心处于非常散乱或者昏沉的状态之中。虽然可以种些善根，但直接的益处不大。如《菩提行经》说：“喻于重病入，诸事不宁忍，散乱心亦然，不堪诸事业。心散乱不定，闻思惟观察，如器之渗漏，于水不能盛。”（卷第一）所以，我们要善用其心，才能把事情真正做好、做圆满，才能达到“熟处能生”的境界。

善用其心，不仅表现在做事的过程中，而且还体现在做事前的有效规划和充分准备。做事应该提前综合



考量各种因素,细心筹划,合理安排,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中庸》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比如我们要拍摄十分钟的录像,提前一天就要开始调试机器做准备才行,虽然我们主观上会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客观条件往往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所以,我们必须提早准备,否则,一旦机器出现故障,拍摄就无法顺利进行。正如常言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但有时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件事情我会了”,“我做过了”,“我已做过很多遍了,怎么会有问题呢?”但事实上,最后我们还是没做好。面对不圆满的结果,我们可能会责怪别人不配合,也可能抱怨条件不具足,或者找其它原因来推卸责任,但却没有认真去反省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事情做得不成功、不圆满。如果我们善用其心,事先把各种因素考虑进去,认真准备,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努力“生处能熟、熟处能生”。哪怕一件事情已经做过一百遍、一千遍,都要把它当成第一次做一样,这样才能够真正生巧,否则就是不用心。

当然,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要培养精进的精神。只有下定决心,克服困难,才能达到“生处能熟、熟处能生”的境界。正如《中庸》中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遗教经》说:“汝等比丘,若勤精进,则事无难者。是故汝等当勤精进,譬如小水常流则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数数懈怠,譬如钻火未热而息,虽欲得火,火难可得。是名精进。”百折不挠的精进力能使我们在困难、挫折面前不退缩,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锲而不舍地反复练习、实践必能突破困境,达到技艺纯熟、善巧应变的高度。反之,如果一遇到困难就起退转之心,那么“生处能熟,熟处能生”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所以说“困难不应退,皆由修力成”就

是精进的体现。

二、听经闻法常熏习,恭敬希求得真意

我们在学习,也要经过“生处能熟,熟处能生”的过程。

听法不是简单地听一遍就可以了,而是要不断熏习。唐朝道宣律师年轻的时候曾经跟随智首律师听受《四分律》,历经多年,听了二十遍,才往山林修习定慧。如《宋高僧传》记载:“释道宣……十五厌俗,诵习诸经,依智顗律师受业。……隋大业年中从智首律师受具。武德中依首习律。才听一遍,方议修禅,顗师呵曰:‘夫适遐自迩,因微知章,修舍有时,功愿须满,未宜即去律也!’抑令听二十遍已,乃坐山林行定慧。”(卷第十四)

但是听法的次数多了,有些人也可能会慢慢疲掉。比如,我们在寺庙里面,一句话可能听了一百遍、一千遍都不受用。但是到了其它地方参访善知识,善知识跟我们说的也是这句话,听了反而非常受用。同样的一句话,为什么受用差异这么大呢?原因就是 we 参访的善知识是生处,所以我们很希求,很在意,听了就接受,容易相应。而我们平时天天听,天天学,听久了,学久了,如果熟处不能生,熟处不能巧,法就不能入心,就会学得疲厌,最终学不下去,更谈不上把佛法学好,将来会有什么成就。

《杂宝藏经》中有一个“老比丘得四果缘”的故事,讲的是以强大的希求心听法而获大受益:

佛法宽广,济度无涯,至心求道,无不获果,乃至戏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时,有老比丘,年已朽迈,神情昏塞,见诸年少比丘种种说法,闻说四果,心生羡慕,语少比丘言:“汝等聪慧,愿以四果,以用与我。”诸年少比丘嗤而语言:“我有四果,须得好食然后相与。”

时老比丘闻其此语,欢喜发中,即解钦婆,用贸所须,寻即施設种种肴膳请少比丘,求乞四果。诸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丘,语言:“大德!汝

在此舍一角头坐,当与尔果。”时老比丘闻已欢喜,如语而坐。诸少比丘即以皮鞠(皮球)打其头上,而语之言:“此是须陀洹果。”老比丘闻已,系念不散,即获初果。

诸少比丘复弄之言:“向尔虽得须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次当与尔斯陀含果。”时老比丘获初果故,心转增进,即复移坐。诸少比丘复以鞠打头,而语之言:“与尔二果。”时老比丘益加专念,即证二果。

诸少比丘复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含果,犹有往来生死之难,汝更移坐,我当与尔阿那含果。”时老比丘如言移坐,诸少比丘复以鞠打,而语之言:“我今与尔第三之果。”时老比丘闻已欢喜,倍加至心,即时复证阿那含果。

诸少比丘复弄之言:“汝今已得不还之果,然故于色无色界受有漏身,无常迁坏,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当与尔阿罗汉果。”时老比丘如语移坐,诸少比丘复以皮鞠撩打其头,而语之言:“我今与尔彼第四果。”时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证罗汉。

得四果已,甚大欢喜,设诸肴膳、种种香花请少比丘,报其恩德,与少比丘共论道品无漏功德。诸少比丘发言滞塞,时老比丘方语之言:“我已证得罗汉果已。”诸少比丘闻其此言,咸皆谢悔先戏弄罪。是故行人宜应念善,乃至戏弄犹获实报,况至心也!(卷第九)

所以,听闻佛法希求心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希求心很强的时候,就能够很专注地听别人在说什么;反之,如果没有希求心,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么再好的法对我们也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诸经要集·敬法篇》说:“夫欲听法,要须真心,敬法重人,至诚出离。”(卷第二)《优婆塞戒经·自利利他品》说:“从他听时具十六事:一者时听;二者乐听;三者至心听;四者恭敬听;五者不求过听;六者不为议论听;七者不为胜听;八者听时不轻说者;九者听时不轻于法;十者听时终不自轻;十一、听时远离五盖(贪

欲、瞋恚、睡眠、掉悔、疑);十二、听时为受持读;十三、听时为除五欲;十四、听时为具信心;十五、听时为调众生;十六、听时为断闻根。”(卷二)我们每次听到善知识的言教都应该像第一次听到那样至诚希求,只有这样去用心,经过日积月累不断的熏习,才能法义入心,变改心意。

三、同行久处贵和敬,半生不熟难和谐

与人相处也是如此。刚开始,大家彼此不熟悉,说话、做事都很陌生,或者说不习惯,渐渐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生处能熟,就是大家相处久了就熟悉了,新鲜感没有了,也就容易生起无所谓的心了,就会越来越看不到周围人的功德,心里还会认为大家都不过如此,都不怎么样。因而,就会常常对同行善友观过,随着观过的习气越来越重,最后即便自己身边有很高量的师友,也会视而不见,无法从同行身上学到佛法。

例如元朝普瑞法师《华严悬谈会玄记》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杜顺和尚的一位弟子远到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结果发现自己的老师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而自己竟然舍近求远。故事说:“有一门人,师未终前告假。师问:‘将何往?’僧曰:‘欲暂往五峰礼文殊去。’师微笑曰:‘汝必欲去,吾有一偈可助汝行色,当消息之。偈曰:游子漫波波,台山礼土坡,文殊祇者是,何处觅弥陀。’僧不喻旨,遂去。至台山,遇老土问:‘子何来?’僧曰:‘礼文殊来。’土曰:‘文殊今不在山,子来何益?’僧曰:‘文殊今在何所?’土曰:‘在长安教化众生去也。’僧曰:‘某是长安人,今长安谁为文殊?’土曰:‘杜顺和尚乃文殊耳。’僧闻,耸然失声曰:‘杜顺是我师也!’奄忽中,老土乃失。僧审所告不妄,兼道而回。至浚水,水忽瀑涨,凡三日方济。到寺,和尚昨日已化矣。以此方知是文殊应身也。”(卷三十八)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人仰视和俯视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仰视的心态就是向上看,对佛、法、僧三宝的希求心,努力追求进步的心,这是我们学佛法最基本的心态。我们常常会认为佛菩萨在他方世界,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对着他方世界看不到的佛菩萨产生向上仰望的心。俯视是向下看，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具体人或事的时候，我们往往怀着居高临下的心态，不知不觉就会觉得比别人高一等，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只有自己是最高明的，所以我们的眼光是往下看的。如果我们以俯视的心态往下看，人不知不觉就会生活在半空中，而不是活在具体的现实世界里，自然而然就很难与别人和谐相处。

所以，我们应该以一个如理净善的心态与同行善友相处。因为同行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修行助伴，对我们生命成长的意义非常重要。如《度世品经》说：“等心敬善友，利义皆由之。”（卷第一）善知识有三种——外护善知识、同行善知识和教授善知识。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善知识，指的是教授善知识。同行善友就是我们的同行善知识。如《摩诃止观》说：“知识有三种：一外护，二同行，三教授。……更相策发不眠不散，日有其新切磋琢磨，同心齐志如乘一船，互相敬重如视世尊，是名同行。”（卷第四）

我们对同行善友还应该保持一颗恭敬心。如《别译杂阿含经》说：“云何于亲友，爱重如己身？不应于亲友，伺觅其过失。亲友心愿同，相念常不忘。如是之亲友，不为他沮坏，应当恒敬念，爱重如己身。”（卷第十一）《佛说海龙王经》说：“复有四事得值善友。何谓四？不慢无谄，常加恭敬，柔和顺言而不自大，常受言教，是为四。”（卷第一）《佛说孛经抄》中说：“有十事知爱厚：远别不忘、相见喜欢、美味相呼、过言忍之、闻善加欢、见恶忠谏、难为能为、不相传私、急事为解、贫贱不弃。是为十爱厚。”

我们还应该多观察、随喜、赞叹身边同行善友的功德，这样不但能够让我们保持欢喜的心态，还能增进彼此了解，加深法缘。如《释氏要览》说：“朋友有三要法：一者见有失，辄相晓谏；二见有好事，深生随喜；三在苦厄，不相弃舍。”（卷第三）《瑜伽师地论》说：“若诸菩萨成就五相，令善友性作信依处，令他远闻极生净信，何况亲睹？一者胜妙，威仪圆满，威仪寂静，威仪具足，一

切支分皆无躁动。二者敦肃，三业现行无掉无扰。三者无矫，不为诳他故思诈现严整威仪。四者无嫉，终不于他说法所得利养恭敬生不堪忍，而常自励请他说法；复恒劝余于彼广施利养恭敬，无谄伪心；又常于他其心纯净，见彼说法及得财敬深生随喜，如自所获利养恭敬心生欢喜，见他所得利养恭敬其心欢喜复过于是。五者俭约，勤储器物，随得随舍。”（卷第四十四）而我们有一些人的问题恰恰是很难对同行善友的功德产生真切的欢喜心，所以也就不能真正分享到别人的功德。

同行善友之间贵在能够长期和敬相处，正所谓“日久见人心”。如《论语·里仁第四》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又《论语·公冶长第五》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隋朝智者大师《法界次第初门·六和敬》说：“一、同戒；二、同见；三、同行；四、身慈；五、口慈；六、意慈。次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而辩六和敬者，菩萨既能善用四种同情之法摄得众生，为成就故，必须久处。若不同爱敬，则两不和合，不得尽成般若，是为魔事。若善用六和，则与一切冥同，必得善始令终，则能安立一切于菩提大道。故次四摄而明之也。此六通名和敬者，外同他善，谓之为和；内自谦卑，名之为敬。菩萨与物共事，外则同物行善，内则常自谦卑，故名和敬。”（卷下）

如果我们生处不能熟，熟处不能生、熟处不能巧，善友相处就会有障碍，就会觉得好像很熟悉，却又感觉越来越陌生。这是一个什么心态呢？简单说，就是一种半生不熟的心态。刚刚开始没有进入佛门的时候，对佛法、对寺庙不了解，只是觉得寺庙好、出家人生活好，而后慢慢对环境熟悉了，就逐渐不用心了。没有希求心了，每天就不能很好地发心，不能很好地用功，这样，虽然熟了，却不能生巧。比如，你现在负责大寮，如果认为每天只要把饭煮熟就足够了，慢慢这种心态会持续等流，那么就会以这种心态去对待任何人、任何事，内心就会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难以认清自己，内心就越来越无奈，越来越难以超越自我。

当我们内心对佛法没有真实体会，内心封闭起来

的时候,就会以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周围人都不理解自己。这样,我们越是对身边的人,越是容易观过,而对离我们很远的人,或者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比如不在同一个部门、组别的人反而很要好,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向对方倾诉。再有一种情况是,有人觉得与人关系不好相处,有事情就不愿意去找熟人,而是去找生人。为什么他会想到去找生人呢?因为心里认为周围熟悉的人中没有高明的,生人才可能是高明

的,因为不熟悉而仰视,所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或者是俯视心理在作怪,觉得自己比这个新人高,希望讲给别人,希望开导别人。这些都是我们用功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去纠正的错误心理。

所以,修行不是做出来给人看的,而是发自内心深处,并落实在内心深处的。修行是修心,要生处能熟、熟处能生。

《中国佛教文化史》出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刊讯 6月24日,由南开大学、中华书局、横山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佛教文化史》出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横山会所召开。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湛如法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向学法师、宗性法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心川、黄夏年、魏道儒,北京大学楼宇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南开大学高永久,以及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

与会学者对孙昌武教授历时二十年呕心沥血的五卷本《中国佛教文化史》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祝贺。

在首发式上,南开大学高永久教授、中华书局顾青副总编、黄心川教授、湛如法师先后致词。湛如法师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在二十多年前结识孙昌武先生的经历,对孙先生数年来甘于寂寞,潜心研究的学术品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孙先生的《中国佛教文化史》无论从研究规模,还是研究体例来说,都是迄今为止最有学术价值和佛教文化功底的学术著作,此书的出版发行将对中国佛教文化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佛教文化史》全书上、中、下三编,共五卷,计180万字,是一部全面、细致地描述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历史,阐发中国佛教文化伟大成就、总结中国佛教文化发展规律的著作。该书内容丰富,论述系统,史料翔实,分析深刻,在对中国佛教文化史的研究上有颇多建树。作者认为,宗教的核心是信仰,其全部

活动围绕着信仰并为确立信仰服务。中国对于外来佛教从消极地接受到理解、积极的消化汲取,并广泛的对思想文化领域造成影响,是从两晋之初开始的。从其输入的那一天起,就进入了“中国化”过程,中国通过佛教——这一南亚、中亚广阔地域、众多民族文化的载体,成功的吸纳、借鉴外来佛教文化,逐渐建设、自成体系,发展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创造了成就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与儒家和道教文化并列,成为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三大支柱之一。中国佛教文化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建设和演变而不断发展和充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本书全面总结了佛教文化的成就、价值和意义,揭示外来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步融入中国文化传统并发扬光大的规律,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研讨中,与会学者和法师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佛教文化史》进行了评述,希望作者继续发扬自身专长与佛学结合,创作出更多的精品。

孙昌武先生是南开大学文学教授,专攻古典文学,兼治佛教文化数十年,据悉,已出版《唐代文学与佛教》、《佛教与中国文学》、《禅思与诗情》、《文坛佛影》、《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等相关著作。孙昌武教授自八十年代以来,就相关课题执教于日本神户大学、早稻田大学、韩国岭南大学、捷克查理大学、台湾静宜大学等学府。

(桑吉 邢婷婷)